

• 哲学传统研究 •

20 世纪中国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李维武

摘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入 21 世纪后,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笔者的这些思考与探索,得到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陶德麟教授的鼓励与支持。

关键词: 20 世纪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陶德麟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10)04-0056-15

一、从一段往事讲起

我由中国哲学研究入手,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是与武汉大学哲学系几位老师的教诲、引导与支持分不开的。陶德麟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再度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外来哲学,在中国思想世界面临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困难性。不少学者主张开展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希望以此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与尊重,但这样一来,恰恰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互为“他者”,并不能真正解决这种困难性。正是这样,我感到有必要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视域入手,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百年之间已经作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参与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创造,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已获得了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2003 年春夏之交,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点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我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会上,我谈了自己在当时的一个构想:20

作者简介: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世纪中国哲学问题主要集中在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政治哲学问题三个层面上；环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20 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了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也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国不少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孙中山、前期冯友兰、晚年梁漱溟等，都曾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吸取思想资源。这一现象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中国化历程，实已转化成了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我讲完后，陶老师即说：“讲得好！”他进而指出，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上，确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梁漱溟这样有自己一套哲学理论的现代新儒家人物，能够在晚年学习、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补充修正自己的哲学理论，正是这种影响力的有力证明。陶老师的讲话对我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促使我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理论阐发。不久，我把自己的这些构想写成了《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03 年第 11 期。这篇文章相继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哲学原理》2004 年第 1 期、《新华文摘》2004 年第 4 期转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以后，我又参加了陶老师与何萍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一书的撰稿工作。我的已毕业硕士研究生祝薇，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从梁漱溟晚年的思想转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影响》一文，我将这篇文章向主编者作了推荐，希望能纳入书中。陶老师对这篇文章很重视，不仅将文章纳入书中，而且亲自作了修改补充。为了深入阐发研究梁漱溟思想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陶老师在修改中专门补充了一段文字，指出：“梁漱溟始终没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仍然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但这对我们要说明的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经历了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而且在吸收过程中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想资料。”^①陶老师的这些补充，可谓一语破的，深刻地揭示了研究梁漱溟思想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视域的独到理解。

陶老师的鼓励与支持，激发我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视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深入探索，几年下来发表了一批文章，形成了更系统更完善的研究思路与理解框架。^②在这里，我将自己的这一思路与框架作一概述，以此祝贺陶老师八十华诞，衷心感谢他多年来对我的鼓励与支持！

^① 陶德麟、何萍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32 页。

^② 参见拙文《形态、问题与思潮：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载《学术月刊》，2004 年第 9 期；《20 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 21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载《学术月刊》，2006 年第 3 期；《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社会思潮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关系简论》，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载《江汉论坛》，2008 年第 11 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载《理论视野》，2008 年第 12 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如何继承？》，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 年第 6 期。

二、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最近30年间已获得了逐渐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这一研究也存在着一个有待认真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后,往往仍然只是被看作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①。这一问题,在过去的长时期中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在文化保守主义再度兴起的今天却变得严峻起来。因为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作为一种“在中国的哲学”,实际上仍然是外来哲学,并没有真正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而只有作为一种“中国的哲学”,才算真正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才有资格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正是这样,借用今天人们常用的话语说,在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存在着困难性。

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关键一点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进行反思,作出转化。在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视域。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一来,所强调和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自我发展、自我丰富和自我完善,即强调和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不同于中国哲学的外来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今天人们经常谈论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其实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这种“对话”之所以被提倡,正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仍然互为“他者”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但仍然只是一种“在中国的哲学”,而不是一种“中国的哲学”,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与之不同,我认为还可以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一来,所强调和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经过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经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已经参与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的创造,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由哲学思潮转化为社会思潮,造成了伟大的社会革新运动,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获得了中国广大人民的接受与认同。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由“在中国的哲学”成功地转化为“中国的哲学”了,就像一千年前佛教哲学完成这种转化一样。因此,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已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由此可见,要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需要在研究视域上作出一个大的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来看,这一研究视域包括了三方面内容:(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2)马克

^① 金岳霖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一书所写《审查报告》中认为:“‘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金岳霖文集》(第1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7页]本文借用这一提法,来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遭遇的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思主义哲学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思潮;(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首先就面临一个传统问题。因为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来源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承继西方哲学传统而来,中国哲学则在数千年发展中有着自成一系的哲学传统,而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并没有大规模的交流和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取得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已清醒地意识到解答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937 年,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一年以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①著名论题时,更对这一问题作了经典性的说明,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毛泽东的这些主张,强调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哲学传统建立起联系,从而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形态转换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取得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但是,如何看待中国哲学传统,近百年来则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从商周之际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哲学是自成一系发展起来的,孔子开启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哲学的主流,这就是中国哲学传统。至于鸦片战争后中西古今文化与哲学的碰撞、交流、融会,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哲学的蓬勃开展,则是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冲击、破坏和背离。早在新文化运动初始之时,东方文化派代表人物杜亚泉就已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一方面,他强调中国思想数千年来有着自成一系的传统,认

^① 这一提法原出自毛泽东著《论新阶段》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58—659 页)。这一部分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者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为：“我国先民，于思想之统整一方面，最为精神所集注。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说，皆致力于统整者。后世大儒亦大都绍述前闻，未闻独创异说；即或耽黄老之学，究释氏之典，亦皆吸收其精义，与儒术醇化。故我国之有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①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引入西方思想来冲击和破坏这一传统，认为：“吾人往时羡慕西洋人之富强，乃谓彼之主义主张，取其一即足以救济吾人，于是拾其一二断片，以击破己国固有之文明。此等主义主张之输入，直与猩红热、梅毒等之输入无异。”^②这一观点，到今天仍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认同和延续，以反对“反传统”为旗帜，形成对新文化运动及20世纪中国哲学严峻的批判。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自鸦片战争起经历了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亦可称为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因此，中国哲学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传统，而不是像杜亚泉等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只有一种传统。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③在这里，毛泽东从中国文化变迁的总体走向上立论，指出了中国学术和思想的传统在鸦片战争后有一个更新问题，经过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形成了中国学术和思想的新传统。40年后，冯契在对近代中国的哲学历史进行反思时，更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在近代中国经历了由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现在人们一谈到传统，往往专指古代传统。我们有五千年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一百余年间（主要是20世纪）形成的近代传统。”^④他进而认为，伴随文化传统的转变，中国哲学传统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他反复指出：“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的近代传统。”^⑤“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⑥在这里，他强调这一哲学传统的转变不是一种量的变化，而是一种质的变化，因此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冯契所说的中国哲

①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载《杜亚泉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8页。

② 同上书，第311—312页。

③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④ 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载《冯契文集》（第8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

⑤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史料学简编〉序》，载《冯契文集》（第9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⑥ 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载《冯契文集》（第8卷），第608页。

学近代传统,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或 20 世纪中国哲学传统。

如果把上述两种观点验之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实际历程,显然只有后一种观点才能够深刻地揭示和准确地把握这一历程的开展及其本质。中国哲学中的现代性因素,早在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思潮中即已孕育,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些新因素仍然因为受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诸多限制而一直处于“难产”状态,未能从古代形态中国哲学中接生出近代形态中国哲学。只有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发生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大规模传入以及中西古今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中国哲学才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由古代形态转为近代形态并继而转为现代形态。19 世纪中后期的短短几十年,中国哲学经历了由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而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开始,中国哲学又由严复开其端而转向现代形态。严复引入西方近代经验主义传统和现代经验证实原则,在经验论的基础上解构了中国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中一直存在着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杂糅的状况,以牛顿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框架建构起完全近代意义的科学宇宙论体系,标志着中国哲学开始转入现代形态的开展。经过新文化运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进入了全面的发展时期,不仅通过 1923—1924 年科学与玄学论战,提出并探讨了科学与哲学、知识论与本体论诸关系问题,而且于 20 世纪 30—40 年代出现了一批分属不同思潮的中国哲学家,融会中西古今哲学资源,创造了具有个性化特征的现代形态哲学体系,以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或曲折或直接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这些体系性的建构,是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标志性思想成果。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生成,中国哲学现代性的确立,正是通过这些体系性建构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来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给予了中国哲学传统以深刻的改造,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中国哲学现代传统。

这一新的哲学传统,从内容上看,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一些传统的文化因素、哲学因素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实现。如经世致用学风、公羊三世说、民本思想,这些本不具有现代性的古代哲学资源,却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这些传统的因素,由于这种作用而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继续成为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有机内容。另一个方面,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又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及哲学的强烈影响下实现的。西方哲学中那些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内容,包括发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中国化过程,逐渐为中国哲学家所吸纳和融会,而成为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外来的因素,构成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与本土传统不相同的重要内容。第三个方面,20 世纪中国哲学家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历史条件下,吸取并综合中西古今哲学资源进行了新的创造,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现代形态哲学体系的建构,标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的实现。在这些新哲学体系中,不仅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金岳霖的“道论”,而且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如毛泽东的“实践论”、冯契的“智慧说”。这三个方面的因

素,使得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中,既有对以往中国哲学传统的继承,也有对以往中国哲学传统的更新。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现代传统并不是脱离了几千年中国哲学发展大道的思想歧出。只是在这一传统中,传统的更新与传统的继承相比处于主要的位置,有着更多的内容和更大的影响。这种状况的出现,其实也不足怪。如非这样,有着几千年厚重历史的中国哲学要在两个世纪中实现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要在短短百年间得以生成和发展,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中国哲学传统建立联系时,就必须面对这两种中国哲学传统观进行思考与选择:是只承认一种中国哲学传统,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联系,局限于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联系?还是承认两种中国哲学传统,既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古代传统的联系,更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联系?如果只承认一种中国哲学传统,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就不可能有着共同的传统,也就必然永远地互为“他者”,不断地“对话”下去。这种“对话”,只要遵循学术平等的精神,也会产生许多积极的成果,但还不足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取得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如果承认两种中国哲学传统,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就在中国哲学现代传统上有了共同点,已经不再互为“他者”了。这样一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自然接上了中国哲学传统,从而能够取得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显然,只有后一种中国哲学传统观,才是具有历史主义态度的合理选择。

由此来看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实已隐含了这一选择:“孔夫子”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的代表,而“孙中山”则可以视为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的象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与继承,实应包括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而对于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来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则显得更为重要。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思潮

20 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时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诸多哲学思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相互激荡。在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史上,可以说没有一个时期有过这么多的思潮。这些思潮之间,除了相互争鸣、彼此交锋外,又往往存在着相互交叉、彼此吸取,并不是截然分开、完全对立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形成,正是通过 20 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互激荡、相互论争、相互影响、相互吸取而实现的。在这种哲学思潮的纵横起伏、相激互融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示出自己的生命活力与理论魅力,深刻影响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走向,积极参与了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塑造,从而融入到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积淀为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内容。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置于 20 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开展中加以研

究,才能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要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联系,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 20 世纪中国哲学问题。正是在这些哲学问题上,集中体现了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 20 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 20 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20 世纪中国哲学问题具有十分复杂的内容。从逻辑上看,即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这些哲学问题主要集中在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政治哲学问题三个层面上。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环绕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既相互激荡、相互论争,又相互影响、相互吸取,使自己融入到 20 世纪中国哲学开展之中,积极参与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的创造。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是哲学长期以来反复探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本体论问题尤为古老、最为抽象。在这种反复探讨中,哲学家们或建构一个个哲学体系,或解构一个个哲学体系,由此而申发理想,寄寓希望,寻求智慧,倾注感情,重建一个民族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20 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通过这种思考和探讨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正是这样,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最为深刻也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也因此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与科学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之间的相激互融,由之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逐步深入。其间,有两次哲学论争最能体现这三大哲学思潮的复杂联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影响尤大。第一次哲学论争是发生于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互融的第一个交汇点。论战之初,形成了以张君勱为首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相互争鸣的格局。科学派推进了科学主义思潮,在高扬科学、反对蒙昧的同时,对科学的意义和科学方法的效用作了空前的放大,认为运用科学方法可以解决宇宙人生的一切问题,否定了形而上学(即玄学)的意义,丁文江就强调 20 世纪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①的方向发展。玄学派则推进了人文主义思潮,反对科学万能论,认为人生观问题是科学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来解决,张君勱即认为现在正是重建形而上学的“新玄学时代”^②。随着论战的深入开展,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介入论争,形成了论战中的唯物史观派。陈独秀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 20 世纪哲学发展的方向。瞿秋白则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

①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载《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8 页。

② 张君勱:《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载《科学与人生观》,第 100 页。

概括得了”^①，而有自己的宇宙观，这就是“第亚力克谛(互辩证)的唯物论”^②。这样一来，科学与玄学论战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最初起点。第二次哲学论争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这场论战的主要发难者张东荪与叶青，就他们当时的政治立场论，一个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假马克思主义者；但如果就他们的哲学观点看，则张东荪站在人文主义思潮立场，叶青站在科学主义思潮立场，分别对唯物辩证法作了不同的理解：张东荪认为，唯物辩证法只研究了哲学的社会背景和条件，并未研究本体论问题，因而不是一种纯粹哲学；叶青则认为，唯物辩证法已在今天演变为科学，不再具有本体论的性质，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在两人的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中，又包含着共同点，即他们都认为唯物辩证法没有自己的本体论，不能算是哲学。这就把本体论问题尖锐地提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面前，因而有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作出鲜明凸显和系统阐发。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论争，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③，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最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④，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同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互融实现的。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一些内容也可以说是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和自身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但更主要的却是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和中国文化的选择直接联系在一起。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历史，是中国被卷入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而发生巨大变迁的历史，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而造成中西古今文化大碰撞、大交流、大融会的历史，是中国由封建社会经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急剧转变的历史。如何看待这一翻天覆地的文化历史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着力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得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这些问题实际上是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必须

① 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之意义》，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② 同上。

③ 李达：《社会学大纲》，载《李达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④ 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载《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

首先思考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正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1919年,李大钊著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第一次鲜明地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所阐发的就是唯物史观及其与之相关联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初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①,实代表了中国一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初步掌握唯物史观后,即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文化问题,解答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和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是在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的相激互融中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环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用唯物史观衡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争,杨明斋著《评中西文化观》即是其代表作。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又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中国当代社会结构,而有郭沫若、吕振羽的古史研究著作和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社会调查。这就把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从思辨的玄想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深刻性与合理性。正是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前期冯友兰的历史哲学、晚年梁漱溟的文化哲学,都曾吸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吸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吸取了重视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而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是在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中实现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诸问题中,政治哲学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的回答。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变迁中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之而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这些思潮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1919年,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所展开

^①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就是中国自由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一次思想交锋。正是这种思想的碰撞,促成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也促使许多新青年在其影响下转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是在经历对自由主义等不同政治哲学思潮的选择后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正如他在1920年底所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①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又吸取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潮中的合理内容。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与阐发,中国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是在与这些思潮的相激互融中,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显示出自己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优越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就已经彻底解决。最近30年来,随着思想空间的开放,中国思想世界又一次呈现出不同政治哲学思潮相互争鸣的思想格局,自由主义、政治儒学、新左派等思潮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上纷纷发出不同的声音。如何看待这些思潮?如何评价这些思潮?如何回应这些思潮?如何在这些思潮的起伏激荡中选择社会主义中国前进的方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面临着创新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哲学的任务。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样离不开与20世纪中国其他政治哲学思潮的复杂关联。

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环绕上述三个不同层面的哲学问题,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互激荡、相互论争、相互影响、相互吸取,深入地参与到20世纪中国哲学的进程中,由一种外来哲学转化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的走向和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塑造。以这些哲学问题为纽结,以这些哲学思潮间的对立与互动为线索,就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其主体内容也就在这里。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

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马克思主义不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出现,而且还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形态出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区别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家的个性化的自由创造,属于精英文化和观念形态的范围;与之相比,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则是针对并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出现的,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吸引了广大中国民众的认同、响应与参与,演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声势浩大的革新中国社会运动。从联系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提供了哲学内核。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正因为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核,才能形成自己思想的原创性的活水源头,才能

^① 毛泽东:《致蔡和森等》,载《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持续地保持自己的活力与激情,才能在理论上说服人、在思想上吸引人,从而形成掌握群众、动员群众、激励群众、指导群众的理论力量。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只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才能与实际生活、社会实践、下层民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造成群众性的社会革新运动,演变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从而实现自己所具有的鲜明实践性格。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系被鲜明地凸显出来。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各种思潮中,还没有一种哲学思想,能够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成功地转化为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给予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以如此巨大、如此深刻的影响,重新塑造了现代中国。正是这样,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 20 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竞争中,最终成为胜利者,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即使是一些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自创哲学体系的著名哲学家,如金岳霖、贺麟、冯友兰,也在新中国诞生后放弃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这种接受和认同,作为民心所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条件之一。正是这样,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在中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在中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并不是仅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开展和理论创新就能够实现的,而需要一些不完全属于哲学或基本不属于哲学的因素的支持。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方式、普及工作、制度保障,就属于这类因素。这些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创发,可能不很重要和必要,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在中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却十分重要和必要。从 20 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系,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在中国发挥作用、产生影响,就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认真的考察。

首先,看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方式。对于社会思潮的开展来说,其哲学内核的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种哲学思想,要想作为某个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真正发挥其作用、其影响,就必须配之以极有力的传播方式、载体与手段,使其向社会各层面作广泛的辐射和深入的渗透,影响社会人心,进行社会动员,掌握广大民众,成为社会运动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时,就已经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把握住了。在 1919 年问题与主义论战中,李大钊就明确指出:“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

解决的希望。”^①因此,他主张:“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②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方式、载体与手段,是与中国现代化运动分不开的。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现代出版业、现代报刊、现代大学教育相继在中国出现,成为了社会思潮哲学内核传播的重要方式、载体与手段。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改良主义思潮、反清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社会思潮之所以能造势一方,相互激荡,产生很大影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有自己的报刊来传播自己的政治哲学:改良主义思潮有《新民丛报》,反清革命思潮有《民报》,无政府主义思潮有《天义报》。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如狂飚崛起,呼啸奋进,陈独秀所创办和主持的《新青年》功莫大焉,而陈独秀也因此成为这个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是与上述这些报刊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朱执信、宋教仁、叶夏声在《民报》上,刘师培在《天义报》上,都发表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连载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向中国人初步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宣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大社会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由此可见,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的出版、办刊、哲学教育活动,尽管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想活动,但却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在中国发挥影响力,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李达1920年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理论刊物——《共产党》,1921年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22年主持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1956年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他的这些活动都可作如此看待,值得从这一意义上加以重视与研究。

其次,看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普及工作。一个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要向下层社会作广泛的辐射和深入的渗透,从而影响、动员和掌握广大下层民众,把他们都吸引到这一思潮中来,还需要进行艰苦不懈的普及工作。这种普及工作,既与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方式有联系,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方式,而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可以说是一项专门性工作。这种普及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中的哲学内核来说尤显重要与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思想为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所了解、所认同、所掌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学会这一工作,是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问世为其标志的。在“大众哲学”这普普通通的四个字里面,实蕴含着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一种创造性的思考,这就是在中国这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东方农业大国里,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更多的没有哲学基础的普通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的行动指南与理论武器。这一点,艾思奇在《大众哲学》第四版代序中说得很清楚:“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就没有想到要它走到大学校的课堂里去。……我只希望这本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智识的饥荒,却不敢

①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同上。

妄想一定要到尊贵的大学生们的手里,因为它不是装璜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这样的大饼,在吃草根树皮的广大中国灾民,虽然已经没有能力享受,但形式粗俗,没有修饰剪裁,更不加香料和蜜糖,‘埋头’在学院式的读物里的阔少们,自然是要觉得不够味的。”^①《大众哲学》从初版到1949年12月共印行32版,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引导许多进步青年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革命道路。而从“大众哲学”中引发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联系,必须关注和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是如何通过普及工作而影响、动员、掌握中国广大下层民众的。

再次,看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制度保障。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思想,都是哲学家、思想家个性化的自由思考、自由创造的产物,其传播、其普及也非一定与制度有关。即使与制度有关,如秦汉以降儒家哲学的开展与制度化儒学的出现有着联系,隋唐时期佛教哲学的盛行与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有着联系,也往往不是这些哲学思想开展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社会思潮的开展中,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与普及,则往往与制度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联,依靠制度作为一种有力的保障。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与普及中尤为鲜明地表现出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了多种制度,有力地保障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与普及。例如,通过创办特殊的学校,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就是一种重要的制度保障。这方面典型事例很多:1921年,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聘请李达任学长,向学员讲授唯物史观;1923年,国共两党联合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受中共中央委派出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通过授课和讲义首先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形成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讲义,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他的哲学名篇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两部分。又如,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全党整风运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与研究必须结合中国问题,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态度,也是一种重要的制度保障。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讲话中,即从整顿党风的高度,要求从党的理论家到党校的学员都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同解决中国问题结合起来,指出:“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

^① 艾思奇:《大众哲学》,载《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284页。

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①再如,在历史转折时期,从上至下发动大规模哲学讨论,赋予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以新的哲学内核,以新的思维方式来影响、动员、掌握中国人民,同样是一种制度保障。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即属于这类哲学讨论。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当年底已作了明确说明,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②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制度保障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包含其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一个很大区别。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思想家的个性化思考与创造;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影响力发挥,则需要运用有着强烈政治因素的制度加以保障。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也有过值得吸取的教训。因此,关注与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制度保障问题,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是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联系的重要内容。

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系,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哲学内核的传播方式、普及工作、制度保障等因素,已经超出了一般哲学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哲学史研究与社会思潮史研究的关联。哲学史研究,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重视的是“思”;社会思潮史研究,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属于历史学研究的范围,重视的是“史”。上述这些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中不完全属于哲学或基本不属于哲学的因素,就更多地是属于“史”的内容。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联系,固然少不了哲学史研究,但更多地则是思想史研究,也就是说,除了重视和研究“思”的内容外,更多的是重视和研究“史”的因素。重视和研究这些“史”的因素,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富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说明与把握,是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下转第192页)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4—815页。

^②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访谈录》一文,该文曾以《深入地思考,做出原创性贡献——威廉姆森访谈录》为题,发表于《晋阳学刊》2009年第1期。其英文版先发表于中英双语刊物《逻辑学研究》(广州),2008年第3期,且被日本北海道大学中户川孝治(Koji Nakatogawa)教授翻译成日文,在日文著名刊物《思想》上发表。国际A&HCI刊物*THEORIA*认为此访谈录很重要,尽管先前发表过,但相关刊物都是地域性的,欧美学者看不到,遂决定重新发表此文英文版(2011年)。

附记:《知识及其限度》中译本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文是我为该书中译本所写的“推荐序言”。

(责任编辑:张帆)

(上接第70页)

六、简短的结语

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了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路与框架。从这里可以看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并非不可走出的困境。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通过参与创造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与现代传统,通过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相激互融,通过转化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哲学内核,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有机内容,并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取得了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换言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主潮之一的历史,而不是来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己作为中国哲学的“他者”的“对话”。

(责任编辑:赵司空)

(上接第170页)

技术的巨大威力使得生态环境很容易失衡,而世界各国、各地区应对环境挑战的努力并不完全协调。技术的发展步伐日益加快,使得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人们观念的变革往往滞后,相互牵制,冲突不断。人们工作和生活中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造成对人的自主性、情感和创造活动的无形限制。当前和未来技术哲学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应该是研究如何构建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应用中人与人、人与工具设备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的时候,及时进行这种技术哲学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观念,有可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某些新的思路。中国历史上强调“道法自然”的观念,注重技术活动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和谐,以及技术活动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和谐。尽管这种和谐的技术观念是在自然经济时代形成的,但其中的合理成分具有跨时代的价值。这种技术观念由于其特有的认知模式,曾经在历史上促成许多技术发明,对于当代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希望通过研究中国文化背景的技术哲学,推动国际技术哲学研究多元化的发展,对可能丰富技术哲学的思想宝库有所贡献。

(责任编辑:张帆)

politicalized. First, anti-foundationalism means denying the metaphysics and rationalism for justifying politics and liberalism. Second, Rorty defines the limits of irony, which means that the ironist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private sphere. In other words, Rorty believes that the private sphere is the space or accommodation for philosopher's irony. Thus we are able to get the conclusion that philosophy should be private and philosopher is not entitled to construct the legislation for the people. However, Rorty believes that irony is also the public virtue of the intellectual; they must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reveal the ubiquitous cruelties, and weave the utopian hope for society.

Key words: irony; anti-foundationalism; private /public demarcation; de-divine

• **Studies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Philosophy** LI Wei-wu

Abstract: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has been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y of nation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In my opinion, we need to change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dramatically to study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on the horiz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in order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difficulty. As one of the main trend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has permeated into Chinese spiritual life and become the organic part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It was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creating the modern style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teracting with other trends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being turned into the philosophical core of Marxist social trends. In this sense,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has obtained the "legitimacy" of being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 **Tree Patter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GU Wei-kang

Abstract: When Buddh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t had to change its appearances in order to be adapted in Chinese cultu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to appease the conflict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Master Mou Dispelling Doubts* (《牟子理惑论》), *Treatise on the Sramana Not Having to Bow to the Ruler* (《沙门不敬王者论》) and Zen are three typical cases in Chinese Buddhism histo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o some text examinations and comments to delineate the different patter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Confucianist ideology; *Master Mou Dispelling Doubts* (《牟子理惑论》); *Treatise on the Sramana Not Having to Bow to the Ruler* (《沙门不敬王者论》); Zen Buddhism